晚清小说的国族危机叙事与乌托邦想象——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谈起

黄勇　王沅怡

摘要：晚清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新中国》在国族危机重压下，不约而同地隐匿现实困境，转向未来乌托邦想象。本文通过互文分析揭示，三部作品在叙事中或留下空白，或扭曲危机现实，折射出知识分子在国难面前的焦虑复杂心态。同时，小说在“新中国”图景中复归传统“天下观”，以中国中心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框架重构国际秩序，但评判标准已融入科学、种族等现代因素。这种“回避现实—寄望未来—招魂天下”的叙事模式，既展现了晚清文人应对危机的心理策略，也暴露了其政治想象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国族危机；“天下观”；《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新中国》

The National Crisis Narrative and Utopian Imagination in Late Qing Fiction:Starting from Liang Qichao’s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Huang Yong, Wang Yuanyi

Abstract: Under the heavy pressure of national crisis, the late Qing novels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The New Era,* and *New China* coincidentally concealed the dilemmas of reality and turned toward future utopian imagination. Through an intertex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se three works either leave blanks in their narratives or distort the reality of crisis, reflecting the anxious and complex mentality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face of national calamit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ir visions of a “new China,” the novels restore the traditional “worldview of all under heaven” (tianxia), re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in a framework of Sinocentrism and cosmopolitanism, though their criteria of judgment have incorporated modern factors such as science and race. This narrative pattern of “avoiding reality—placing hope in the future—summoning the tianxia”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ies of late Qing literati in responding to crisis but also expose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ir political imagination.

Keywords: national crisis; “worldview of all under heaven” (tianxia);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The New Era; New China*

引言

1902 年 11 月，《新中国未来记》在《新小说》报上开始连载。对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梁启超起初负有极大热忱，不仅特意保证：“ 本报所登各书，……非如前者《清议报》登《佳人奇遇》之例，将就钉装，语气未完，戛然中止也 ”，还提前许下宏愿，计划在《新中国未来记》外，再写两部姊妹篇——《旧中国未来记》与《桃花源》（一名《海外新中国》）。后因庚子事变、勤王兵败、访问美国等政治事务，世殊事异，梁启超未能再续写《新中国未来记》。

尽管如此，凭借梁启超“ 舆论之骄子 ”的影响力，《新中国未来记》成为晚清“ 新小说 ”的发轫之作。此后，带有现代化启蒙意识等新颖主题的“ 新小说 ”，大量出现在清季文坛。与此同时，《新中国未来记》想象了维新成功 50 年后“ 新中国 ”的模样，并以“ 新中国 ”为终点，倒转时空，对如何从今日之中国行至彼日之“ 新中国 ”展开叙述。这一对未来中国无限憧憬、满怀信心的展望体写作，启发了一系列晚清小说在此基础之上想象“ 新中国 ”。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与陆士谔的《新中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早在《晚清小说史》中，欧阳健就将《新纪元》与《新中国》纳入《新中国未来记》开创的“ 展望体 ”谱系中，认为两部作品受到了梁启超“ 少年中国 ”观念的引领，承继、发扬了《新中国未来记》中对未来中国的蓬勃信心与憧憬心态。到了《想象中国的方法》，王德威将《新中国未来记》与《新纪元》进行并置讨论，指出晚清文人在现实国族危机的逼压下，利用虚构叙事中的科学幻想，假托未来时空，来拯救当下现实。颜健富在《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中，将《新中国未来记》开创的、书写未来中国景象的传统，称作关于未来的“ 极端叙事 ”，认为其在想象中翻转了列强与中国的位置，重新确立中国作为“ 万邦为首 ”的“ 加冕 ”叙事。《新纪元》与《新中国》继承了《新中国未来记》中想象“ 新中国 ”的母题，碧荷馆主人和陆士谔也沿着梁启超构建的“ 新中国 ”历史发展框架，以小说的形式凝结刻画“ 新中国 ”不同发展阶段的样貌。本文对三部小说的互文式探讨，旨在从小说叙事的角度，考察晚清知识分子心态的焦虑与复杂。

一、国族危机叙事：空白与扭曲

1840 年以来，外国列强的侵入，使晚清知识分子逐渐主动或被动认清“ 天朝崩溃 ”之现实。“ 屡战屡败 ”的时局与巨大的国力落差，都让晚清知识分子内心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焦虑与紧张心态。焦虑与紧张难以纾解，自诩担负了救国重任的晚清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形式展露出了这种煎熬心态。小说创作也是其中之一。从《新中国未来记》开始，想象未来“ 新中国 ”之景的晚清小说，便集中体现出，现实国族危机已成为知识分子难以提笔言说的心头梦魇。

叙述是一种态度，空白亦是一种态度。晚清知识分子对于现实国族危机的心理认知，不约而同地从后一种选择中被隐约传达出来。之所以是“ 空白 ”，很难说与《新中国未来记》无关。《新中国未来记》以大学士孔觉民在维新五十年大典（1962 年）向中外众人演说的形式，倒叙 1902 年至 1962 年的中国史事。孔觉民将演说主题定为《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把过去六十年的中国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一、预备时代；二、分治时代；三、统一时代；四、殖产时代；五、外竞时代；六、雄飞时代。参考孔觉民对六个发展阶段的释义，《新中国未来记》现存的五回故事，还停留在“ 预

备时代”初期。如何从“旧中国”抵达“新中国”，“新中国”的未来究竟是如何面貌，都被留下了叙事空白。

逝者如斯夫，从后世历史时空回望，我们并不能了解梁启超仅书五回便搁笔的详细心迹。一天能著数千言的梁任公，也罕见地没有为《新中国未来记》的“流产”作任何辩白。但结合历史事实与彼时同梁启超交往的多方人物来看，《新中国未来记》仅书五回留下的叙事空白，并不在梁启超原有的计划之内。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密切往来，一度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甚至在《清议报》上宣扬激进主张，引起康有为不满。此后梁启超辗转檀香山、澳洲等地，直至 1903 年 2 月才得以访美。然而，在美国的亲身经历，让梁启超打消了在中国实现共和制的念头。以美国共和制与联邦制为革新蓝本的《新中国未来记》，自然无法续写。于是，如何从“旧中国”抵达“新中国”，尤其当日薄西山的清廷仍名义上控制全国，一民主自治的省份如何破土而出，进而唤起多省份响应，迈开中国退虏送穷的现代化步伐，被留下了空白。现实里复杂紧迫的国族危机，让梁启超无法轻松做出判断，写下结论。

如果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叙事空白，是梁启超受时代因素叠合影响下的被动产物，那么，《新纪元》中的叙事空白，则不能不说是作家权衡现实与小说虚构后的主观产物。

《新纪元》书写“未来中国”的野心显然比《新中国未来记》更上一层楼。《新纪元》直接跳过“预备”“分治”等前期阶段，从 1999 年立宪强国写起，并详细描绘一场中国领导的黄白种族大战。至于“旧中国”如何摆脱积贫积弱、重建政体与国力，作者只字未提——仅提及 1939 年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一处“过去”事件。国族危机本是使小说展开想象的原始驱动力，却在实际叙事中化为真空般的黑洞。这种刻意回避，恰恰显露出碧荷馆主人面对“如何抵达新中国”这一诘问时的深层焦虑。

到了《新中国》，国族危机异化为单薄的历史符号，尽数丧失了现实时空中沉重危急的涵义。国族危机现实再次隐遁，在小说中留下了一块变形的空白。之所以选择将国族危机如此呈现，陆士谔显然吸取了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未能成书的教训。《新中国》第一回基本再现了《新中国未来记》开头的行文架构：先设置一未来中国，再回过神来叙述从“旧中国”行至“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小说家陆士谔深知，以一己之力，想象并书写“旧中国”如何一步一脚印地抵达“新中国”是无比艰难的。一是这对自己的想象力与政治判断力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连大名鼎鼎的梁任公都无法就这问题给出一个妥善的定论，《新中国未来记》仅书五回便无疾而终；二是篇幅的难题，如果像写史般亦步亦趋地记录下“旧中国”至“新中国”的过程，小说篇幅起码达百回之上，这可不是陆士谔惯常的写作风格。

陆士谔未必拥有梁启超那般深邃敏锐的政治眼光，却绝对有着远在任公之上的小说技艺。于是，小说开头应怎样设法让“新中国”出场呢，陆士谔把《新中国未来记》中已成社会现实的“新中国”，变成了《新中国》里自己到“新中国”梦游一场；又应如何谈及“旧中国”，呈现“旧中国”至“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呢，陆士谔把梁启超使用倒叙手法，让孔老先生从 60 年前开始讲述，变更成友人李友琴来回答“我”对“新中国”的诸多疑问，又将“旧中国”至“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缩短至 40 年，方便进一步压缩叙述这一历史进程。一番费心设计下来，历经筹还国债、振兴实业、筹建海军三个步骤，“旧中国”便可完成向“新中国”衍变的必要物质积累，为“新中国”重新雄飞于世，

打下坚实的经济军事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创作宗旨与《新中国未来记》相去甚远——相比起用小说就如何纾解国族危机输出政论观，陆士谔倾向于用《新中国》表达一种寄希望于未来的美好幻想。因此，现实国族危机究竟如何艰深困重，“ 旧中国 ” 究竟应如何切实有效地自我革新至 “ 新中国 ”，陆士谔并不在乎。陆士谔为 “ 中国近代史四十年 ” 草草制定的 “ 史纲 ”（以新上海剧院上演剧目的形式），也透露出这一点。“ 旧中国 ” 革新至 “ 新中国 ” 大致要经过十个阶段：一、甲午战争；二、戊戌政变；三、庚子拳祸；四、预备立宪；五、请开国会；六、筹还国债；七、振兴实业；八、创立海军；九、召集国会；十、改订条约。为独立自主、民富兵强的 “ 新中国 ” 奠定坚实物质基础的，只有 “ 筹还国债 ”“ 振兴实业 ”“ 创立海军 ” 这三个阶段。而无论是面对国家财政无力偿还巨额国债，外资、外货与外国技术人才全盘撤出，还是初创国产海军缺乏技术支撑的难题，都在全国人民勠力同心、精忠报国的崇高信念下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国家财政无力偿还外债，全国人民就一齐捐财献宝，把外债还清；外资撤出，全国洋行商办便集资设立一大公司，生产一切民众所需的物品；初创国产海军缺乏技术积累，中国留学生就齐刷刷选择学成归国，躬身研究军事制造……沉重的国族危机投影到《新中国》故事里，异化为极其平面单薄的符号。若国族危机真如陆士谔叙述的这般，能被轻松化解，现实国族危机究竟还有何必要与立场，唤起知识分子创作政治小说，以怨刺沉重复杂的政治现实？

显然陆士谔也不太相信自己花费大力气写下的，所谓全国人民勠力同心、共克国族危机的假设。有一处细节暴露了陆士谔矛盾犹疑的创作心理。为了解释 “ 旧中国 ” 之败坏人心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好转突变，陆士谔费心地设计了苏汉民这位科学超人。1915 年，苏汉民发明了医心药与催醒术，从此可医治人心一切邪恶、败坏的因素，将人改邪归正，又可使一切混沌迷糊之人清醒过来。苏汉民名声大噪，产品行销全国。可是，此前 1910 年 “ 筹还国债 ” 与 “ 振兴实业 ” 两项事业的成功，不正依赖了全国上下同心协力，为国奉献、共克时艰吗？如果 1910 年 “ 旧中国 ” 之 “ 东亚病夫 ”（小说中提及 1915 年之前，欧美日称中国人为 “ 东亚病夫 ”）已经有此良心，苏汉民还有何必要再到 1915 年发明医心药？并且，为了证实 “ 旧中国 ” 人心之强大力量，陆士谔还额外举出了拒赌会的例子。1910 年，有识之士发起拒赌会，宣传赌博之弊端与戒赌对救国的必要性，“ 人心究竟不是木石，渐渐醒悟 ”，此后，中国便再也没有人赌博。若 “ 人心究竟不是木石 ”，只需宣传机器的潜移默化即可扭转，若 1910 年的中国人能一鼓作气地戒赌，那到了 1915 年，中国人为何还需要医心药与催醒术？为何欧美日还将 1915 年医心药发明前的中国人称作 “ 东亚病夫 ”？

此外，《新中国》除了在前一二回集中展现了过去 40 年 “ 旧中国 ” 如何发展至 “ 新中国 ”，余下十回总体在刻画 “ 新中国 ” 的社会面貌，如宽阔整洁的马路、全由中国人担任的警察与捕快、城市地下铁路交通、海军操演等。长于 “ 故事新编 ” 的陆士谔，从不缺乏想象力，但面对如何从 “ 旧中国 ” 抵达 “ 新中国 ” 这一命题，他向来轻盈恣肆的笔端也不免感到重重压力。于是，就在 “ 新中国 ” 里梦游一回吧，难以言说的国族危机就极尽简单化、扁平化，从而尽兴想象 “ 新中国 ” 富强美好的未来。当 “ 新中国 ” 已重新成为天下的主宰者，世界再无威胁中国生存的战争，陆士谔就合时宜地不慎 “ ‘ 拍蹋 ’ 一交 ”，从梦中跌醒，返回现实之中国。陆士谔在《新中国》中难以倾

吐的，便是国族危机施予知识分子的迷茫和语塞。

二、乌托邦想象：“天下观”复归

晚清政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与“世界”——即西方国家的相遇。向来对外务不以为然的中国，竟然一次又一次地在与西方的冲突中落败。在甲午战争中，甚至输给了“蕞尔小国”日本。长久以来，以“天下观”为主要思想资源构筑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秩序，在此番相遇中土崩瓦解。再顽固、再自傲的晚清知识分子，都在愈发急迫的现实国族危机前，抛弃了与现实世界相悖的“天下观”，转而接受现实的“世界”秩序。此时的“世界”体系由西方国家主导，中国自然被排除在外。中国的首要之务即是进入“世界”，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及改善中国国家地位的问题。“旧中国”由此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征程。对于中国能否成功跻身“世界”，再次腾飞于世界民族之林，梁启超持乐观态度：“虽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见此伟天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然而，《新中国未来记》的无疾而终，与现实中梁任公一变再变的政治主张，终可见，“旧中国”走向“世界”，蜕变为“新中国”之进程，将无比艰难。

尽管如此，“天下观”当真在知识分子的心态里一去不复返了吗？《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和《新中国》三部小说告诉我们，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在现实危机中，晚清知识分子暂时搁置传统“天下观”，转而接受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然而在小说虚构中，一旦“新中国”具备足够实力，他们便纷纷为“天下观”招魂。金观涛指出，民族主义在中国常具有工具性，条件允许时，世界大同的道德理想便会重新浮现。

当然，复归并非原样照搬，而是结合新思潮的“创造”。正类似于王汎森对清末历史记忆的认识，“历史观念的复返，当然不一定是完全恢复原先的旧观，它可能是提醒原来被压抑在意识底层的一些稀薄的东西，也可能是一种‘创造’（invention）”。复归的“天下观”受近世思潮与著作者个人知识结构的影响，具体涵义或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核心主旨仍沿袭了传统“天下观”的内核——中国中心主义与世界主义。

“天下观”是古代中国特有的观念，其内容包括地理空间结构、文化伦理机制与政治秩序建构等方面，涵义丰富、庞乱交杂。许倬云将文化伦理机制视作“天下观”内涵的核心：“几千年来，所谓“天下”，并不是中国自以为‘世界只有如此大’，而是以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同一的人文伦理秩序。”“光天化日之下，同一的人文伦理秩序”自然是儒家界定的普世价值。因此，自古以来，“中国自诩为文明中心，遂建构了中国与四邻的朝贡制度与内部边区的赐封、羁縻、土司诸种制度”，中国中心主义成为“天下观”的一大表征。中国中心主义来源于“夷夏之辨”，种族地位的分辨与排序又以“文野之辩”为原则。这意味着，文明可在“文”与“野”之间不断转化与流通。“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只要域外文明服膺于华夏儒家普世价值观，他们便能化而为“文”，变成“我人”。而“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若域外文明对华夏文明体系不感兴趣，中国也不会强力输出华夏文明观，只是不免将该文明认知为“野”了。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的眼光是“天下观”的另一大表征。进入近代，固有“天下观”在现实国族危机前难以为继，随着西学传入，罗志田提出，过去的“天下”实际上分化为今日“中国”与“世界”的双重内涵。“中国”即意为中国中心主义；“世界”即意为世界主义。故此，

接下来，本文将从中国中心主义与世界主义两个层面出发，考察《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新中国》中“天下观”复归的表现。

三部小说中，最早出版的《新中国未来记》比较忠实地复现了传统“天下观”。梁启超着重强调的是“文野之辩”在“新中国”的恢复。本是维新五十年大祝典的时机，国民会议却特地决议，值此时机一并在上海开设大博览会。大博览会并不以商务、工艺等展览为特色，反而以各种学问、宗教的集合演说为主要看点。于是，各国名家大儒、学者学生纷纷前来听讲，总人数不下数万人。各国学者此番前来，是为交流分享，还是意在求教呢？任公在旁批中专门补充道：“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馀者正不知凡几”。可知，把偌大上海围地水泄不通的人群，都是来中国求教学习的罢了。具体来中国学什么呢？且看：京师大学校史学部在会场中央占了一块极大的区域，第一次讲演吸引了两万人来听，其中还有一千多位外国人；当天讲题为《中国近六十年史》，由孔子后人、全国教育会会长、中国第一硕儒孔弘道老先生主讲。“新中国”对外国人最大的吸引力，一如古代，还是文化伦理层面的儒家普世价值观。古代中国的儒家学说与史学密不可分，孔子耗费一生心血编撰《春秋》即是明证。因此，任公也特意在旁批中说：“中国史学将来必为世界上第一重要学科无疑。以地球第一大民族，养数千年来特色，谁得而比之！”虽然“新中国”不再傲慢地将不认同儒家价值观的域外文明视作野蛮、落后的“野”，但在梁启超的叙述中，仍以儒家思想为文明底色的“新中国”，显然具备优于他国的巨大文化优越性，且必将复现往日华夏文明辉煌的向心力与号召力。此番笔调已暗含将前来求教、认同儒家价值观的国家，视为“文”，并纳入华夏文明圈的意味。

除此之外，万国太平会议的开设，也透露出世界主义观念的回归。万国太平会议本是西方传入的事物。19 世纪 90 年代，李提摩太、林乐知、蔡尔康借用春秋时期的“弭兵”说，引进了国际和平会议话题，之后，该话题得到郑观应与康梁一派的积极响应。“万国太平会议”与“万国和平会”会等说法，便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流行开来。田涛认为，该话题之所以能激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鸣，既是近代西方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了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大同理想，与天下观中世界主义思想传统在晚清的回响。古代中国颇具天下主义色彩的思想资源，与近代西方和平主义思潮彼此融汇缠绕，启发了晚清知识分子对和平世界的美好想象。世界和平的大同理想古已有之，梁启超设想中的万国太平会议则特殊在，该机构总部设立在“新中国”，各国代表也聚集在南京商讨定约。联想现实世界里联合国的架构设置，“新中国”俨然又成为传统“天下观”中的“天朝上国”。并且，在孔弘道的《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里，外竞时代的中国，号召成立了亚洲同盟会。虽然与叙述万国太平会议成立的情况类似，梁启超仍未指明中国是这些国际组织的主要发起国，然而该组织的名称——“同盟会”已经从侧面佐证了，中国是亚洲同盟会的主要发起国。结合上文所述，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时，在日本的梁任公正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颇有好感，在小说创作中采用“同盟会”的名称，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中国》同样在中国中心主义与世界主义两个方面，再现了传统“天下观”。然而，陆士谔结合时代发展潮流，拓宽了“文野之辩”在“新中国”的向度与内涵。首先便是，“文野之辩”的判定标准，不再是儒家价值观，而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科学。《新中国未来记》曾写道：“原

来自我国维新以后，各种学术进步甚速”，而到了《新中国》，这句话就变成了“这会子，海陆两军都是全球第一，……就是学问，无论那一种科学，比了各国，总要胜起两三倍还不止”。科学成了学问的代名词。而陆士谔眼中的“科学”，显然是近代以来西方传入的科学（而非中国古代说的“格致”之类的东西）。医学大家苏汉民是故事中唯一被反复提及的，生活在“新中国”的人物。他不仅发明了催人醒悟的医心药、催醒术，能去污涤垢，杀死一切微生虫的汽浴，还发明了能拔除人犯罪恶念的药。虽然陆士谔希望西方医学“医治”败坏人心的想法不免有些幼稚，但他对于现代科学精神的理解——实证性、逻辑自洽性是比较准确的。苏汉民发明医心药与催醒术后，欧美日等国纷纷派学生来南洋公学学习，毕业生应聘出洋当教员的也很多。这次，外国人来中国求教的不是儒家价值观与中国史学，而是原产于西方的现代医学。尽管汉语教材行销海外，汉文成为通行全球万国的语言，然而，很显然，外国人不是为了学习儒家价值观而掌握汉文，而是为了向中国求教科学才事先学习汉文。科学，成为陆士谔笔下“新中国”的文明之基。从教育会长孔弘道到医学大家苏汉民，两个核心人物职业与名字的变化，也揭示了陆士谔对于“文野之辩”的崭新思考。

之所以科学成为“文野之辩”的标准，是因为陆士谔深刻意识到，科学技术同经济发展与军事腾飞之间，有着强大的正相关性。“我”参观针厂，不免疑惑我国的造针过程怎如此简便。友琴女士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欧洲机器与我国机器相比、犹之四十年前，手工与机器相比也。华货所以畅销，欧货所以滞销，都是这个缘故。”中国实业凭借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已将产品卖到了世界上所有国所有行业，世界范围内没有对手。“新中国”实现军事腾飞亦是有赖于先进科技人才。西方世界给“旧中国”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实际都从海上来，建设强有力的海军队伍是晚清知识分子的夙愿。于是，在陆士谔的设想中，“新中国”实现军事腾飞的关键在于拥有规模、战力都领先世界的海军。而海军的成功创设全赖“科学昌明，人材极盛”，连原料钢材都是理化科进士黄帝孙发明的新练法，“坚固灵便，都非他国所能及”。

尽管“新中国”实业行销海外，海军冠绝全球，全国人心又已被医心药与催醒术祛除了一切邪心杂念，似乎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富强之国家，“新中国”仍然推行和平主义理念，世界主义思想依然指导着“新中国”维系国际秩序。驻守在吴淞口的海军都督戎一就说道：“讲起兵力来，我国的海陆两军，杀出去，那一国挡的住！”只是，中国人素来爱好和平，有着最悠久的止战思想，只要他人不来进犯，我国对别国的土地没有兴趣。然而，世界其他国家却不怀有与中国类似的世界主义观念，“倘使这点子兵力，移在别个国度里，恐怕世界就不能这么太平了！”为了推动构建和平无战的世界体系，“新中国”还号召发起了弭兵会与万国裁判衙门两个国际组织。陆士谔放弃了梁启超谦虚中庸的作风，坦率地承认“新中国”是以上两个国际组织的主要发起国，且中国大皇帝任弭兵会会长，法学大家夏永昌老先生任万国裁判衙门正裁判员。英、美两国代表，在两个组织中也只能居于“新中国”之下。以“新中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似乎重回了传统天下观所构筑的同心圆模式：“中国自以为是这一文明的首善之区，文明之所寄托，于是‘天下’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同心圆，一层一层的开化”。

《新纪元》的天下观，则呈现出一种对种族民族主义观的吸收。经历了黄白种族大战，从一立宪制的富强国家跃升为世界一霸的“新中国”，

将科学与种族观念纳入了“ 文野之辩 ”的话语标准之中，通过上述两方面来构建中国中心的地位。先来谈科学。碧荷馆主人开宗明义，在第一回中便说明“ 可见世界的进化与科学的发达，为同一之比例 ”，将来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中国与白人国家的种族大战，实质也变成了科学武器大赛。大杀伤力、高防御性的武器装备，取代其他任何因素，成为这场战争决胜条件。中国元帅黄之盛本人就是一位科学大家，在天文、农务、水师、陆师等专门学堂都拿过文凭，他的妻子金景嫄、哥哥黄之强也对科学颇有研究。在战局吃紧时，两位科学奇人洪继泉、刘教习送来了洞九渊、化水为火术等扭转战势的先进武器。武器装备落后的白人国家，就此输掉了战争。而虽然中国各项武器的名字与古代道家法术颇有渊源，但这不代表碧荷馆主人有着现代科学比不过传统法术的“ 义和团 ”式迷信。对于每一项登场的武器，碧荷馆主人都尝试从化学、物理原理的角度，解释武器的运转原理。哪怕是听起来最像道家法术的追魂砂，实质也只是一类异常明亮的固体。碧荷馆主人对于科学的理解，符合西方现代科学的本义。在此基础上的黄白种族大战，就变成了双方科学技术先进程度的较量。科学成为推动“ 新中国 ”重回领先世界地位的关键。

其次，种族观念也成了“ 新中国 ”组建与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种族观念本是西方兴起的概念。自现代植物分类学之父、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用 luridus（意为浅黄的，死一般的，可怕的）一带有贬义的词语指代亚洲人后，西方语境的“ 黄种 ”概念就带有了文化歧视色彩。19 世纪中叶后，中国劳工吃苦耐劳、勤恳敬业的工作作风在北美、澳洲引起西方人的忌惮，加上日本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均取得了意料之外的胜利，西方便炮制出臭名昭著的“ 黄祸论 ”。革命派利用种族观念推进反满计划，1900 年后在舆论界掀起尊崇黄帝的风潮，为汉族中心主义寻找历史源头。与封建时代中国组建的朝贡体系不同，《新纪元》中“ 新中国 ”不再只通过文化层面的儒家价值观来判定“ 夷夏 ”，而更加强调生物意义上的种族因素。匈牙利远在欧洲腹地，按文化传统来看，不应该被纳入中国政治势力辐射的文明圈。但因为匈牙利国内有三分之二人口是汉族血统，匈皇便来信中国皇帝乞求庇护，中国作为母族母国，难以推辞，只能派兵前去，与白人国家正面对战。

孙隆基认为，黄帝纪年被社会广泛承认并尊崇，意味着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主义秩序中脱离，转而被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中国也踏上了从泛孔教文明国家，向西方发明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之路。《新纪元》中“ 新中国 ”就是在此意义上开展了天下主义思想的崭新实践。传统天下观中的世界主义思想，裂变为种族内外的两套体系、双重内涵。在黄种人内部，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文明圈，仍延续了朝贡体系中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秩序。中国是母族母国，负有保护藩属国的责任，各藩属国内部的政权统治与国家治理则各行其是，中国不作干预。而在种族外，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原产于西方的殖民主义体系对待白种国家。碧荷馆主人设计的停战和约如下：

…… ……

四、各国当公认赔偿此次兵费银一千兆两，以五百兆归黄种各国，分作十年交清。

五、美、澳、非三洲内华人侨居之地方，俱画作华商租界，中国政府于各该租界内应有治外法权。

六、新加坡、锡兰岛、孟买、苏彝士河、阿德利亚基克海峡等处，俱许中国屯泊军舰，并许中国军舰有航行苏彝士河及地中海之权。

…… ……

赔款、割地、让权，这简直就是《辛丑条约》的翻版。王尔敏曾指出，西方国家依仗国力构筑的殖民主义体系并非以公约为底线，而以强权为原则。以存祀主义为原则的传统朝贡体系，在近代与西方列强相遇后，不免显得幼稚与妄自尊大。因为，与榨取利益、永绝后患的作风相比，儒家传统诚信观下的道德自律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在碧荷馆主人的想象中，当中国拥有了与西方世界向匹敌的综合实力时，也要拾起这套强权的武器，报复当初挥动强权大棒，宰治中国的仇敌。自 1908 年出版后，《新纪元》不断再版。至 1936 年，已出至第八版。可见，现实时空危急的国族危机阴影下，国人多么期盼一场针对西方世界，攻守易势的复仇行动。

结语

国族危机促使晚清知识分子将希望投向未来，赋予“未来”以光明灿烂的崭新意义。三部小说在“新中国”图景中恢复“天下观”秩序，却回避了过渡路径的艰难。这种叙事模式既呈现了他们的心理补偿策略，也暴露出政治想象的内在矛盾。

参考文献：

[1] 王汎森 . 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 [C]// 王汎森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73.

[2] 王尔敏 .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8-90.

[3] 许倬云 .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布 [M].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0: 20.

[4] 罗志田 .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26.

[5] 孙隆基 . 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J]. 历史研究，2000 (3): 68-79.

[6] 郭世佑 . 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 [J]. 浙江学刊，2002 (2): 54-65.

[7] 桑兵 .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 [J]. 近代史研究，2003 (3): 41-99.

[8] 罗志田 . 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 [J]. 中国社会科学，2007 (5): 191-204.

[9] 田涛 . 晚清知识界的弭兵说 [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 (1): 38-43.

[10] 姜红 .“黄帝”与“孔子”：晚清报刊“想象中国”的两种符号框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 (1): 5-20.

[11] 李广益 .“黄种”与晚清中国的乌托邦想象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 (3): 13-28.

[12] 茅海建 . 康有为与“弭兵会”：兼论翁同龢荐康有为说 [J]. 清史研究，2022 (6): 22-43.

作者简介：

黄勇，广东揭阳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记忆写作等。

王沅怡，广东茂名人，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